

燕园师林

冯友兰的学术风范与特色

·张翼星

燕南园,本是北大校园内唯一的一座著名教授住宅区,学术精英荟萃之地。园内座落灰色二层小楼一群,间以多种树木花草。往日,走进燕南园,顿感文化的厚重和环境的幽雅。风雨沧桑数十年,大师们陆续驾鹤西去,住房多已改作他用。如今,走进燕南园,不免有点苍凉、褪色的感觉。

去年底,燕南园57号被正式定名为“冯友兰故居”。冯先生在此居住30多年。他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说:“庭中有三松,抚而盘桓,较渊明犹多其二焉。”因此,他又称这里为“三松堂”。冯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。居此期间,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,在政治大环境下,虽多经坎坷与磨难,仍哲学新见迭出,并着力完成巨著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七卷本。在一所大学校园内设置名人故居,并不多见,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。这里不仅修葺一新,而且开辟了会议室、陈列室、接待室等场所,可供学术文化的观摩、研讨和交流,促进经常的学术文化活动的开展。这便使略显褪色的燕南园闪出一个新的亮点,使校园文化建设的色彩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大学本是学术文化的场所,不是休闲娱乐的场所,更不是商业交易的场所。中小学校或家长带领学生或孩子来参观北大校园,重在了解北大的历史、文化内涵,受到学术文化的熏陶,以利孩子的成长和成才。可是当前经常络绎不绝、熙熙攘攘的参观游览者中,大都欣赏湖光、塔影、观光馆、堂、楼、阁,就连北大精神开创者蔡元培的塑像,因偏处一隅而又背向未名湖,也往往擦肩而过。这种状况,常使我感到困惑。我想,冯友兰故居的设置,若在往后条件允许时,能引导游览者井然有序地进行观摩,了解冯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风格,从一个角度认识“大学乃大师之谓,非大楼之谓也。”那么,故居设定的文化价值,岂不更上一层楼么?

对冯先生的学问与修养,我仰慕已久,印象颇深者,说来有四:

一曰文字功夫。冯先生的主要著述,他在1990年95岁时作了一个概括:“三史释今古,六书记贞元。”所谓“三史”,即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;所谓“六书”,即《新理学》、《新事论》、《新世训》、《新原人》、《新原道》、《新知言》。这是以《新理学》为核心的一个哲学体系。冯先生是哲学家兼哲学史家。他是我国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,也是我国现代为数不多的自创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。他的著述,达到了三个融合:古今融合、中西融合、史论融合。读他的著述,有一种自然、舒畅的感觉,因为这全是他自己的见解,自己的语言。他极善于把自己的某些难解的思想和文字,通过自己的辨别和理解,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



燕南园57号 校报记者 于璞 摄

来,而不失原意。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本领,一种文字表达的功夫。这种本领和功夫,我们在朱光潜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著译里也见到过。但朱先生主要是译解西方柏拉图、黑格尔、维柯等人的思想;胡适先生的专门哲学著述并不多。他的《中国古代哲学大纲》,只出了上卷。冯先生的“三史”、“六书”则是全面、系统地体现其治学功夫和文字功夫。国人读来,容易获得一种特殊的享受和情趣。

我特别喜欢冯先生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。记得年轻时读《古文观止》,读到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,感到文词华美而情志鲜明。如写位置:“星分翼轸,地接衡庐”;写景色: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;写志向:“君子见机,达人知命。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;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”显得很美,也很有气势。这似乎把骈文推向一个高峰,后人恐难以企及和超越了。但后来读到冯先生的纪念碑文时,更感到在抗战胜利之际,冯先生将西南联大在抗日时期的艰难历程、卓越成就和丰富经验,在极短的篇幅中,以深沉的思考和洗炼的文词,概略无遗。如写联大之使命:“今日之胜利,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,而联合大学之使命,与抗战相始终”;写三校之合作:“同无妨异,异不害同,五色交辉,相得益彰;八音合奏,终和且平”;写成功主因:“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,转移一时社会之风气,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来‘民主堡垒’之称号,违千夫之谮语,作一士之谥号。”这最后两句,掷地有声。值得反复吟诵,王勃是路过滕王阁,触景生情,即兴抒发个人感慨。序文布局严谨,对仗工整,激情洋溢,一气呵成。不失为古代骈文中的一枝奇葩,但不免包含某些个人恩怨和悲凉色彩。冯友兰则是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,回顾和总结西南联大的历史与经验。碑文文字洗

炼,节奏鲜明,情理并茂,气势磅礴,充分体现了联大师生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,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。由于富含哲理,显得境界、格调更高,可视我国现代碑文中的一种典范。

二曰学术奇迹。“中国哲学史”,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,是由冯先生奠定的。他在1934年全文出版《中国哲学史》(上下卷),分“子学时代”与“经学时代”两部分,涵盖先秦至清代的哲学思想,内容十分完整。1947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时,又以英文撰著并出版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他在此书“自序”中说:“历稽载籍,良史必有三长:才、学、识。学者,史料精熟也;识者,选材精当也;才者,文笔精妙也。著小史者,意在通俗,不易展其学,而其识其才,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。”

1949年之后,他更集中精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,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和阐述,便有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逐步形成。但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,全部重新加以整理、反思和创造,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由于社会震荡和政治运动的干扰,他的这项工程曾几度被迫中断,但他始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“欲罢不能”的心态,坚持这项事业。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,从85到95岁高龄而多病的岁月中,他终于完成了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七卷本的修订和改写,其中最后一卷,属现代中国哲学部分,全属新的创作,是至为重要而又十分难写的部分,恰恰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独立见解。如此巨大篇幅的理论工程、哲学创造,在如此高龄期间独立完成,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三曰教育贡献。冯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,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。过去,杜威和胡适先生都曾讲,历来的大哲学家,都是教育家。我想,这是因为哲学和教育有基

本相通的方面,都以人为研究对象。哲学给人以智慧,使人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;教育给人以启迪,使人发掘和实现自己的潜能。教育要以哲学为指导,哲学的宗旨要通过教育来实现。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,同时也是哲学家。他要求培育一种“健全的人格”,在重视德、智、体相结合的同时,也十分重视世界观的教育,特别是美育。

冯先生的一生,也是从事教育的一生,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。正如宗璞(冯先生的女儿)所说:“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,几十年如一日,始终在北大、清华、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:学术至上、为学术而学术、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等。”他在清华曾担任文学院院长长达18年之久。他也是上世纪30年代“清华学派”的重要成员,与同事一道,培育了一股学术新风。在西南联大,他也曾担任文学院院长。在教学、研究和管理以外,还开设了一系列学术讲座,并且积极参与联大校训的讨论,撰写校歌歌词,最后,写就了那篇震撼人心的纪念碑文。此外,他也写过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文章,如《论大学教育》、《大学与学术独立》等。1958年,他发表了以《树立一个对立面》为题的文章,认为在一个社会里,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分工是必要的;综合大学的哲学系,正是培养专做或多做理论工作的人,这就要求系统地钻研经典著作,掌握文献资料,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分析概念和范畴等等。因此,他有针对性地强调,哲学系应当培养哲学工作者,而不能只是普通劳动者。现在看来,这批是不言自明的道理,而当时却受到严厉的批判,这也正是冯先生的“违千夫之谮语,作一士之谥号”吧。

四曰国际影响。一个民族,要自立和振兴于世界民族之林,必须在科学和理论上有所创造,必须有一批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。我国在先秦时代确有一批大思想家,如孔、孟、老、庄,等等,不仅为民族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,而且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。但自近代以来,这样的大哲学家和国际影响,就比较少了。

冯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由他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,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。后来用英文写成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,为便于外国人阅读,篇幅较小,写得更加通俗易懂,更适用于非哲学专业的人士阅读。这两本书都被译成多国文字,在海外特别是西方的许多大学里,长期被指定为学习中国哲学的基本教材。李慎之先生曾说:“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,外国人便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。”这种评价是有一定根据的。冯先生和他的著作的这种重大国际影响,以及他在向国外传播和评介中国哲学,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上所起的显著作用,在现代中国哲学和教育界里是可以彪炳史册的。我这里不可能论述冯先生哲学上的特殊贡献,但以上四点,也许是冯先生学术上比较显著的风范和底色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,已退休)

小康路上

故乡的变化

·苏瑞洪

故乡的变化,对于我们这一代土生土长在大都市的孩子来说,似乎无甚印象。然而对于老一辈人,尤其是那些自年少起便背井离乡的人,一路拼杀进城市就此扎根的人,飘洋过海在大洋彼岸遥望中国的人来说,故乡的变化总是充满矛盾的:一方面,他们会欣喜于家乡外在风貌的改善,另一方面,“故乡”连结着他们青涩的回忆,承载着他们心中永远不曾改变的惦念。

我的姥姥便不例外。她出生于一个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小村庄,年轻时在村里做过老师,后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,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,通过知识改变命运,姥姥便举家一路迁往城里,扎根下来。大概10年前,在我小学的时候,我曾在过年的时候陪姥姥去过她的故乡。那个村子很小,没有大都市的热闹与繁华,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就是全村的主干道,沿着它走上片刻就能轻轻松松地跑遍每家每户,对于那时的我来说,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后来伴随着城里升学的压力越来越重,逢年过节我便说什么也不愿意再陪姥姥回乡了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,直到去年年初,村委会给姥姥打来电话,说村里近些年的精准扶贫和设施改造工作颇具成效,想请姥姥这样的老党员们回去看看。接完电话,姥姥便怎么也按捺不住了,归心似箭溢于言表。其实她本是不爱出远门的人,尤其是老了腿脚不好以后,每次下楼去超市买个菜都要抱怨半天。然而这次她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,任凭怎样的路途遥远也挡不住她的热情,我才意识到:此番她不是要去“出远门”,而是“回故乡”。

我们陪姥姥回乡,她一进村逢熟人便打招呼,问问村里这些年的变化,听说曾经村里的田地“退耕还湖”变成了湿地公园,她一定要去亲自走走看看。等到快要离开的时候,她她手提肩扛,拎了四五个大包小包。我们打开一看,里面塞满了邻里街坊送来的各种土产——从李家的柿子到张家的枣,还有温室大棚种出来的小草莓,齐全得可以开个

水果店了。我们试图劝她少带些,毕竟回城的路也远,何况这些东西城里都买得到,可她她却只顾说她在老家吃的特色紫苏酱,那手工研磨的味道独一无二,是城里加工厂做不出来的……这个平凡的小村在她的讲述中变得熠熠生辉,而结果是——我们又多带了两大罐老家的紫苏酱回去。

姥姥从故乡回到了城里,可她的心似乎并舍不得走。以前怎么也不爱用智能手机的她,居然这次主动学会了使用微信,说要时不时跟村里街坊四邻的老姐妹用视频唠唠嗑,她还特意把村子里翻修的新学校设置成了微信壁纸,有事没事便看上两眼。那好不容易带回来的两大罐紫苏酱倒是不常吃了,因为她说好东西得留着,怕太快吃完。其实我尝了,那酱的味道也没什么不同,相较于楼下超市货架上的辣椒酱、豆瓣酱,也没多大口感上的优势,只是加上了“故乡”的烙印,对于姥姥来说便迥然不同了,纵使山珍海味、满汉全席也无可替代。

后来我有幸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有关最美乡村建设的下乡实践,见识到了更多像姥姥一样的人。当这些村民们看见异地扶贫搬迁新建的洋房,崭新的柏油路,脸上的无所适从总是大过欣喜。很多像我一样刚下乡的大学生们,时常会不解于他们对于故乡变化的矛盾心理,后来慢慢了解才晓得,对于他们来说,故乡的变化终究是为了留住那些不变的东西,比如一口不曾改变的乡音,一罐不曾改变味道的酱料,还有一段不曾忘却的回忆。他们害怕随着外物的改变,这些故乡的内在也在有一天跟着变了味。总而言之,“故乡”一词始终承载了中国人太多太多的东西,从生命的诞生之初一直流淌到死亡之处。它是青年时背井离乡的痛,中年时衣锦还乡的梦,老年时落叶归根的乡愁……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我想,只有我们守得住故乡的不变,才能见证中国乡村的最美变化!

(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级本科生)

在写“对联杂谈”时,为压缩篇幅,尽量少说对联以外的话。“杂谈”刊出时,发现不少有故事的好联被遗漏了。这里作些补充。

四川灌县都江堰联

完大禹斧凿功,沃野无双,河渠大书奉守惠,揽全蜀山川秀,导江第一,名园生色艳阳篇。

相传四千多年前,中原洪水滔天,夏禹带领群众疏通水道,把洪水引到江里、河里、海里。水患除去,生产得以恢复,生活得以安定。人民深感夏禹,称他为太禹。约两千年后,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率子劈离堆、分岷江,利用天然水道作水库,筑水门为堤坝,使岷江的水转为平缓,建成都江堰。都江堰既消除了水灾,又灌溉了田地,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,被后人誉为继大禹治水之功的秦时工程。

河北赵州安济桥联

船从碧玉环中去,人在苍龙背上行。

隋文帝时石匠李春等在河北赵州建安济桥(又称赵州桥),桥身跨度大、弧平,大拱两端上方各有两小拱,既节省了材料,又减轻了桥身重量和桥基压力,洪水暴发时又可增大排水量。它是我国著名的石拱桥,1400多年来使用至今。这种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工程技术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江西南昌滕王阁联

滕王何在?剩高阁千秋,剧怜画栋珠帘,都化作空潭云影;
阎公能传,仗书生一序,寄语东南宾主,莫看轻过路人。

唐高祖李渊的第22子李元任洪州(今南昌)都督时,在当地建阁,阁成封滕王,是为滕王阁。其后任都督阎伯屿重修滕王阁,于重九日在阁中大宴宾客。阎事先令其婿作好文,以便当众炫耀。宴会上命人捧纸笔遍请宾客撰文,众知其意,都推辞未写。恰值王勃(唐初四杰之一,时年刚过二十)因省亲过境参加宴会,请到他时,他欣然不写,接过纸笔写了起来。阎伯屿怒而离席,遣吏伺其文辄报。一再报,语益奇,报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,阎连声称“天才”。与会宾客也无不佩服。

王勃的序立时写成,通篇是对仗,音律谐和,造语精炼,文笔优美,气势恢宏,1300多年来一直被推崇。滕王阁也因此名篇而与黄鹤楼、岳阳楼等成为江南名楼圣迹。

洪承畴联

洪承畴是明朝兵部尚书,曾兼任陕西三边总督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,后调任薊辽总督督御清兵,明皇对他宠爱有加,堪称洪恩浩荡。他自书一联:
君恩似海;臣节如山。
后他在抗清时战败被俘降清,有人把他的自书联改成:
君恩似海矣;臣节如山乎?
自吹联变成了讽刺联,改得好!

史可法联

佩鄂国至言,不爱钱,不借命;与文山比烈,日取义,日成仁。
联中鄂国为岳飞,他尽忠报国,在与金人作战中节取胜利时被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,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将他杀害,后人称鄂国。相传曾有人问他如

“对联杂谈”补遗

有故事的对联

·陈诗闻



赵州桥:船从碧玉环中去,人在苍龙背上行

何才能天下太平,他回答“文官不爱钱,武官不惜死”。联中文山即文天祥,他是状元,又是南宋抗元将领,转战在福建、江西、广东一带,终因寡不敌众,战败被俘,在押解到元大都(北京)途中,他写下一首诗《过零丁洋》,诗中最后两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表明他英勇不屈,杀身成仁的决心。在狱中屡次拒绝元军的诱降,最终被杀。

1645年清军南下包围扬州城,守将史可法(时任督师)率守军和市民坚决抵抗,清军五次劝降,都被史可法严辞拒绝,激战七昼夜,史可法壮烈牺牲,扬州失守,清军屠城。
后人将史、洪二人的作为写成忠奸对比联:
史笔留芳,虽未成功总可法;洪恩

浩荡,不能保国反成仇。
此为藏名联,联中“成仇”谐音“承畴”。

黄埔军校联

1924年5月,孙中山在广东创办了黄埔军校,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,我党派周恩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,瞿秋白还去作过演讲,培养了大批新时代为国为民的政治军事人才。军校门前有对联:

升官发财请走别路;贪生怕死莫入此门。

到1927年4月12日,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,逮捕杀害共产党人,迫使校中的共产党人离开军校。把黄埔军校变成网罗培植反共反人民的蒋氏亲信的基地。这时有人把军校的门联改成:

升官发财请入此门;贪生怕死莫走别路。
这一改,说明了后期黄埔军校的实质。

梁启超巧对张之洞

据说清朝末年某一天,梁启超到江夏(今湖北武昌)讲学,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闻他的威望高过自己,在他来访时出了个上联要他对:
“四水第一,四时夏第二,老夫居江夏,谁是第一?谁是第二?”

张之洞的上联意为: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汉水中长江列第一,春、夏、秋、冬中夏季是第二,我坐镇江夏,你来此讲学,谁居第一?谁居第二?
梁启超稍加思索,立即对出下联:
“三教儒在前,三才人在后,小子本儒人,岂敢在前?岂敢在后?”

梁启超对的下联意为:儒、释、道三教中儒家排在前面,天、地、人三才中,人

在最后,我不过是一介书生,岂敢在你之前?但儒是三教之前,我既为儒人,岂能落后呢?

此下联对仗工整,既尊重了张之洞总督,又维护了读书人应有的尊严。张之洞对梁启超很满意,热情款待了梁启超。

对联是说不完的,实在太多了。现举几联励志联作为结束语吧!

水以长流乃及远;山因直上而成高。

说明不忘初衷,贵在坚持。
未出土时有节;到凌云处仍虚心。

咏竹比人品,重在气节操守和谦虚谨慎。

好学近乎智,力行近乎仁,知耻近乎勇;

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。

此联为集句联。上联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。孔子认为智、仁、勇是天下之达德(人人都应具备的品德),做到好好学习、努力执行和懂得耻辱,就能达到智慧、仁爱和勇敢。

下联出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孟子认为:人富了不放纵,遭了贫贱不改变志向,面对威武不屈服。这是坚守节操、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。

如果你有机会去旅游,不妨注意一下各地山川景色、名胜古迹、庵堂庙宇的左右两边楹联上的对联。这些楹联通常结合当地的地理背景和历史人物故事,有精妙的构思,典雅的文字和深刻的意义,供你尽情地学习和欣赏。

(作者为北大物理学院教授,已退休)